

## ※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

# 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

車行健、徐其寧\*

在現今討論顧頡剛(1893-1980)學術影響與其門人弟子的問題時，鮮有人提及何定生(1911-1970)教授<sup>1</sup>。學界對何定生的介紹，寓目所及，唯王學典、孫延杰合撰之《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及張昌華《曾經風雅：文化名人的背影》二書中有所述及<sup>2</sup>。何定生以經學名家，尤其致力於《詩經》的教學與研究。其學術生命的開啟雖受乃師顧頡剛的影響甚鉅，但其過早疏離於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學界所開創的學術事業，尤其是一九三〇年代在顧氏聲望如日中天時所領導的古史辨運動及禹貢學

---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徐其寧，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生。

<sup>1</sup> 關於何定生教授之相關傳記資料留存下來的並不多，較為原始的資料計有《何定生日記》、何定生致顧頡剛及他人之書信、自撰之〈簡歷〉，以及其自撰之著作。而與顧頡剛有關者則保存在《顧頡剛日記》及收入北京中華書局即將出版的《顧頡剛全集》中之《書信集》。本文之作主要依據這些材料，並參酌其家屬的訪問稿、門人曾志雄教授的紀念文章與楊晉龍教授撰寫的〈何定生教授年表〉。關於這些材料的來源說明如下：何定生教授家屬訪問稿係楊晉龍教授採訪整理，《何定生日記》亦由家屬提供，目前由楊晉龍教授整理中。楊教授撰寫的〈何定生教授年表〉已充分利用家屬訪問稿與《何定生日記》這二項材料。本文主要透過楊教授的〈何定生教授年表〉而間接利用了這兩項材料。何教授致顧頡剛及他人的書信則見刊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共計十通。至於《顧頡剛全集·書信集》中收錄之七通顧氏致何定生書信及何定生編著之《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他》一書係由顧潮教授提供。〈簡歷〉則由顧潮教授與山東大學歷史系的王學典教授共同提供，何定生自著《詩的聽入》一書則由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張濤先生至北京大學圖書館複印寄贈，在此一併向資料提供者致上最大謝忱。又本文校樣稿復承顧潮教授指正修訂兩處明顯的錯誤，以及補正了《顧頡剛全集》的卷次頁碼，亦再申謝忱於此。

<sup>2</sup> 王學典、孫延杰：〈始於愛而終於離——顧頡剛與何定生〉，《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頁109-153；張昌華：《曾經風雅：文化名人的背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3-124。

會的歷史地理和邊疆史地領域的新走向<sup>3</sup>，以致在學界中名聲不彰。然何定生一生的治學方向，實與顧頡剛息息相關。事實上，何定生的學術起點，就是從其就讀於廣州中山大學，從學於顧頡剛開始的。當時受顧頡剛啟發而初次點燃學術熱情的年輕大學生，就與顧頡剛熱烈地展開對許多學術議題的討論，如《山海經》的成書年代、《尚書》的文法、《詩經》的研究與詩的起興……等問題。從選題到成文，都是在顧頡剛的提示、鼓勵與指導下進行與完成，其中《詩經》研究甚且成為何定生終生的學問追求。可以說，在何定生的學術生命中，似乎一直伴隨著顧頡剛的巨大身影。甚至在其晚年病重時，他還是念念不忘著他的顧老師，甚盼能夠再見到他，並且能看見他所著的書<sup>4</sup>。

今年是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為紀念這位在臺灣《詩經》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且又具有相當貢獻的前輩學者，本文擬從作為何定生學術淵源及人生導師的顧頡剛和其互動的角度入手，並參酌相關當事人的一手材料，嘗試為何定生的生平及學術經歷，勾勒出一較完整而清晰的圖像。

## 一、賞識與追隨：1927-1929年

何定生，廣東揭陽人，一九一一年生，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就讀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國文系<sup>5</sup>，修習顧頡剛「中國上古史」、「《書經》研究」、「書目指南」課程，一年級學弟陳槃(1905-1999)亦同時修習<sup>6</sup>。此階段二人之信函往來，以問學為主，總計八封<sup>7</sup>，其中六封何定生致顧頡剛信函均載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何定生首次致信顧頡剛，向他詢問《山海經》的相關問題，包括：

### 一、《山海經》到底是何代之書？……

<sup>3</sup> 參鄭良樹：〈序——論顧頡剛之學術歷程及其貢獻〉，《顧頡剛學術年譜簡編》（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頁11-14。

<sup>4</sup> 曾志雄：〈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參見本專輯頁73。

<sup>5</sup> 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參見本專輯頁5。

<sup>6</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卷2，頁138，1929年2月29日。

<sup>7</sup> 可惜的是，此階段顧頡剛回覆的論學信件，除論《山海經》、文法二信尚能寓見，餘皆佚失。

二、《山海經》是不是巫術之書？……

三、關於言《山海經》之書有若干種？……

四、《山海經》此書在學術上有什麼價值？……<sup>8</sup>

顧頡剛三月十九日回信<sup>9</sup>，此回信連同何定生原函同時登載於何定生發表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二集第二十期中的〈山海經成書年代考〉文後<sup>10</sup>。此後，何定生常至顧頡剛處，顧頡剛亦常留之共飯。同年五月一日，何定生又致信向顧頡剛報告對《論衡·亂龍》篇是否為偽作之看法<sup>11</sup>。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復致信詢問文法事。信云：

頡剛先生：古代文法，我想仍須研究個整個的結束。代詞固然有個很有趣的軌道，但，這還於整個的古今文法之變，沒有什麼大的貢獻。……生想便以這一回的興趣，索性寫十萬字來結束古代整個的文法，師以為可否？這種工作，會值得做否？尤望時時加以指導，督促，俾生了這一個小公案也。<sup>12</sup>

何定生自四月二十八日撰成〈漢以前的文法研究〉後，其治學方向便自《論衡》、《山海經》轉向文法研究。這樣的轉變，是在辨偽的需求下，希望能找到一判斷古籍時代先後更方便、更有系統且可信的辨偽量尺，顧頡剛對此自然大加鼓勵。

顧頡剛將何定生原信加註按語，刊載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中，他回應何定生說：

頡剛案，此函所言確是研究古文辭最好的方法；用了這個方法去研究，一定可以打破許多模稜的解釋而得到新的確實的解釋。至於真正不能明白的句子，有了這一番甄別之後，也可說一聲「不懂」而不去強做解釋了。……現

<sup>8</sup> 何定生：〈致顧頡剛〉，《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2集第20期（1928年3月13日），頁640。案：此函實撰於1928年3月8日。

<sup>9</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2，頁146，1928年3月19日。

<sup>10</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2集第20期（1928年3月13日），頁640-641。此函又收入即將出版的《顧頡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中之《書信集·卷二》，頁313-315。

<sup>11</sup> 何定生認為〈亂龍〉不為偽作，原因有二：一、書中不乏祥瑞災異之說，當為敷衍漢室所作之主張；二、王充信命定說，影響因果判斷的真實性。此信登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0期（1928年5月23日），頁1011-1013。

<sup>12</sup> 何定生：〈致顧頡剛〉，《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2期（1928年6月6日），頁1088-1089。案：此函撰於1928年5月25日。

在定生兄有了文法的工具，而又有時代觀念去運用這個工具。不致如《馬氏文通》之混合三千年文句作一種的解剖，必定可以有很大的成功。<sup>13</sup>

六月一日，何定生又詢問〈盤庚〉時代的問題，信云：

日前言及〈盤庚〉時代的話，先生謂當出於西周及東周之間；以其文較〈大誥〉、〈康誥〉……等為易曉，且與〈呂刑〉為近云云。（大致如此，不知有否誤記）此說頗給生以一種新的注意。……

生以為凡研究一個問題，若有一種新的提醒，不論其於結論為合為反，都是絕有利益，如此類是也。生此論〈盤庚〉，即全誤，仍甚愉快。願先生永以此教告之。<sup>14</sup>

七月九日，他再致書顧頡剛詢問《尚書》年代，因感「古代文法，寫到《尚書》，便發生大的岔路，不將此部奇妙之書弄個頭緒，終是寫不下的」<sup>15</sup>。是以有〈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這篇最能代表何定生廣州求學期間的鴻文之寫作。

然而，《尚書》年代問題對於一個二十歲不到的青年來說，畢竟過於龐雜繁複，何定生在此文前寫了有十頁長的「作者的自白」，對撰作期間的苦思歷程有詳盡的敘述。當中特別感謝其師顧頡剛與友人鄭楚生的勉勵，他說：

我友楚生說：「快點寫罷，又在想什麼？」我往往在他這樣的話下接寫下去的。……我學力既完全沒有，聰明又有限，心境又不安靜，這樣勉強寫得有個段落，成文之力宜屬之顧師及我友楚生。<sup>16</sup>

此文因文長，合三期篇幅以專號刊出。刊出後，學界回響頗大，當時學術界的名人錢玄同(1887-1939)、黎錦熙(1890-1978)與胡適(1891-1962)等人，都注意到了這篇文章。如顧頡剛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八日致何定生的信中就對他說道：

當我和你到上海的時候，適之先生對你說：「玄同和劭西都注意你這篇東西

<sup>13</sup> 附於何定生〈致顧頡剛〉文後，《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3集第32期（1928年6月6日），頁1089。未書撰作時間。

<sup>14</sup> 何定生：〈致顧頡剛〉，《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4集第40期（1928年8月1日），頁1447、1449。此函實撰於1928年6月1日。

<sup>15</sup> 何定生：〈致顧頡剛〉，《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4集第42期（1928年8月15日），頁1513。此函撰於1928年7月9日。

<sup>16</sup> 何定生：〈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5集第49-51期合刊（「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專號）（1928年10月17日），頁1787。

了。」我聽了這話，眼前頓覺一亮……。<sup>17</sup>

胡適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的日記中也如此寫道：

今天看見兩篇很有價值的文章。……何定生的〈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49-51）。何君是顧頡剛的學生，方法很細緻。……他只認西周的正確作品只有〈大誥〉，東周的正確作品只有〈費誓〉、〈秦誓〉，其餘都是湊上去的。何君有〈漢以前的文法研究〉一文，見《週刊》第31-33期，〈尚書文法〉一篇乃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變為長篇。<sup>18</sup>

然而何定生卻對突如其來的大名感到不自在，他在致楊筠如的信上，不禁向他透露心聲：

我在上海見適之先生時，他也竟提起我的文來討論；到北平，錢玄同先生都對有所指導。……我自此文發表，臉皮之嫩程度，與時間成正比例。在上海在北平，我凡遇到學術界的大人先生們，我都惴惴然慮頡剛先生給我介紹。有一次我竟向頡剛先生要求了，我說：「先生，你以後不要同人家給我介紹我的大作。」<sup>19</sup>

但愛才惜才也愛護學生的顧頡剛不但積極地向人推介這位當時才大二的年輕學者，而且更體恤何定生家貧，以此文向校方申請二百元獎學金以及學費減免等提議，但卻不幸遭到否決，他在致何定生的信中向他說明具體的情況：

何思敬一加入，就根本反對。他說：「要是一個學生做了一篇論文，學校中就給他幾百元的獎，學校哪能供給得起。況且這篇文章我也看過，其中引某夫人的話，她是文學家，如何可以引用她的話。」<sup>20</sup>

<sup>17</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27。

<sup>18</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第5冊，頁397-399。

<sup>19</sup> 何定生：〈致楊筠如〉，《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8集第91期（1929年7月24日），頁3650。案：此函撰於1929年5月20日。

<sup>20</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16，1928年12月18日。事隔五十餘年，顧頡剛仍對此事耿耿於懷，他在1980年5月18日的日記中追憶此事，如此寫道：「何定生，廣東潮州人。學於中山大學，天分絕高，為一班首。曾以半年之力作〈尚書各篇之時代分析〉。予為之請於校當局，給以獎金二百元。一時忌者蜂起，謠諑紛來（可指名者為伍俶、羅庸、羅常培等）。」（《顧頡剛日記》，卷11，頁710）

此事雖經月餘後方成<sup>21</sup>，但何定生與中山大學嫌隙已生<sup>22</sup>，再加上顧頡剛亦糾葛於人事的紛擾，所以決定北上任教燕京大學<sup>23</sup>。何定生因感念顧頡剛提攜之情，遂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毅然退學，隨顧頡剛北行，經香港，前往上海、杭州、蘇州等地，至五月一日方抵達目的地北平<sup>24</sup>。

## 二、忿隙與疏離：1929-1930年

何定生隨顧頡剛來到北平後，便住在顧頡剛位於北平景山東街的大石作寓所中，一切生活所需，悉由顧頡剛提供。與此同時，顧頡剛也對何定生賦予極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在學問上繼續上進<sup>25</sup>。但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何定生卻趁著顧頡剛返回蘇州之際<sup>26</sup>，假顧頡剛之名，避開審查程序，在樸社出版了《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他》一書<sup>27</sup>。此書因內容涉及對胡適治學方法的批評，出版之後，震驚學界。

<sup>21</sup> 顧潮《顧頡剛年譜》1928年11月下記載道：「為何定生〈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文而請學校當局給彼獎學金二百元。經先生力爭，月餘後事成。」見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64。

<sup>22</sup> 顧頡剛在1980年5月18日的日記中追憶何定生獎學金風波事後，又接著敘述此事對何定生的後續影響，云：「渠不安於位，遂請退學，隨予至蘇、至京。」（《顧頡剛日記》，卷11，頁710）

<sup>23</sup> 關於顧頡剛離開中山大學，北上就燕京大學聘的經過及心理轉折，參車行健：〈田野中的經史學家——顧頡剛學術考察事業中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政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10年6月），頁121-122。

<sup>24</sup> 據顧潮《顧頡剛年譜》記道：1929年2月24日，顧頡剛與家人離廣州，抵香港。何定生退學隨行。26日，啟程北行。3月1日，抵達上海。6日，到杭州，會晤諸親友。4月29日，離開蘇州北上，5月1日，抵達北平。何定生一路同行。（顧潮：《顧頡剛年譜》，頁171、173）

<sup>25</sup> 顧頡剛於1929年10月10日在致何定生的信上說道：「那時的你確是想在學問上上進的。我愛你的有志氣，能用功，所以我帶你北來。」（《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21）

<sup>26</sup> 顧頡剛於是年6月27日離平南下，29日抵蘇，7月為父作壽，直至9月12日方返回北平。（參顧潮：《顧頡剛年譜》，頁175-176）

<sup>27</sup> 此書原名《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關於何定生在樸社出版此書的原委，顧頡剛在1929年9月28日致何定生的信中有清楚的描述：「馮芝生先生說：『金先生講，《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這本書的付印，所以不給我看，為的是何定生說：『這本書已給顧先生看過了。』』這樣付印書，在金先生方面固然手續未合，但你用了我看過的話瞞他，也實在不合。……我是樸社總幹事，尚且自己要出的書都給馮先生審查，為什麼你倒要用了我的名義來逃過馮先生審查一關？」（《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18）

而且又因何定生與顧頡剛有著親密的師生關係，所以當時有不少人認為是顧頡剛假借何定生的名義出版此書，動機是為了挑戰胡適的學術地位。顧頡剛在得知此事之後，大為駭異，馬上在九月二十八日寫信給何定生，責怪他不該出這樣的書：

傅孟真先生見了我，就笑道，「想不到頡剛會出這樣的書！」我前次告你，著這本書的責任，在你固然以為自己負責，但在別人看來必以為是我叫你作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的。從傅先生的話來看，豈不是證實了這個豫測？<sup>28</sup>

年輕氣盛而又「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何定生出版了這本書確實觸及到了胡適與顧頡剛二人敏感的學術神經<sup>29</sup>，顧頡剛的好友王伯祥(1890-1975)從上海來信告誡顧頡剛：

在上海看見了這本書，中間對於胡、顧頗有優劣異同之論，察視出版處所，則為樸社。弟意在此年頭，遇事生風者太多，一朝偶為所弄，不將執此區區，造為胡、顧分裂之論乎？<sup>30</sup>

對乃師胡適極為尊敬的顧頡剛於此書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度極為惶恐<sup>31</sup>，為此他在信中將何定生數落了一頓：

我對於適之先生感情甚好，今你出了這書，使得愛我的人懼二人交情之分裂，足徵「優劣異同之論」的可怕。你是自認傻的，只憑了你的直覺說話，但社會上一班的人原不能知道你的心，只看見一班人的挑撥長技，自然也用了挑撥的眼光來看你，自然也用了結黨的眼光來看我。……你這本書出了兩星期，平、滬兩地看見的不多，已有這些反響……最使我恐怖的，是我和適之先生關係的惡化。我覺得再要尋到像適之先生這樣待我的人已不可得了，若因這書的出版，而經旁人加以煽惑，使我失去這一個良師，如經羅常培們

<sup>28</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18，1929年9月28日。

<sup>29</sup> 「初生之犢不畏虎」是顧頡剛對其行為的評語，見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28，1930年1月18日。

<sup>30</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18，1929年9月28日。

<sup>31</sup> 關於此中曲折，請參王學典、孫延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頁136-139。案：葉青（任卓宣，1896-1990）在1934年8月出版於上海的《胡適批判》中，就已即時地徵引到了這本書對胡適的批評（葉青：《胡適批判》〔上海：辛壘書店，1934年〕，下冊，頁1017）。此書〈序言〉作於1933年8月29日，則該書的完成當在此之前，離《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他》出版不到四年，由此可知，何定生此書在當時確實是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的挑撥而使我失去傅孟真先生這一個良友一樣，我真是痛心極了。<sup>32</sup>

除了寫信責罵何定生，顧頡剛更去函向胡適解釋，同時請求樸社停止發行此書<sup>33</sup>。

顧頡剛在盛怒之下竟向何定生提出分手之議，在致何定生的信中他下了最後通牒：

現在我覺得我們之間只有兩條路可走：

1. 我給你盤費，請你回去。從此以後，你如何捧我或如何罵我，我都不管。
2. 你在北平，生計由你自己設法，不要來問我。我和你維持極簡單的友誼，彼此不要相批評。……

定生，我假使對你有一些辦法，我決不肯如此決絕地對你的。我不敢求你的原諒，但我也希望你想一想我的苦處。我更希望你想一想，照這樣子下去，於你有什麼益處？於我有什麼益處？與其在一種大家苦痛之下容忍下去，何如索性分手，各尋其樂趣之為愈乎？<sup>34</sup>

然而從何定生的角度來說，他原先希望跟隨顧頡剛來北平後再繼續就讀於北平的大學，但據顧頡剛晚年回憶，就是因為他出了這本書「批評胡適，激起北大方面之口舌」，因而最終不得不離開顧頡剛而就讀於山東的齊魯大學<sup>35</sup>，這本書不僅中斷何定生的學習計畫，也為恩師顧頡剛帶來意料外的風波。在學業、事業二空的狀況下，何定生逐漸成為顧頡剛之累。二人性格上的差異，在此時也浮上檯面，形成彼此生活上的摩擦。顧頡剛致信指責他：

至於你住在公寓中，以我不替你付房飯金為不合，不知我有什麼義務來擔承這一個不勞而食的人的生活費？……我並不是一個有錢的人，今年半載閑居，又為家父作壽，又帶了家眷和你跑來跑去，已是一個負債山積的人了。你不想想我的生活的不優裕，要把你自己的生活費一切交付於我，一不如你的意，就寫信來罵我給你難堪，不知你從何得此優越的權力而可以強迫我來

<sup>32</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18-319，1929年9月28日。

<sup>33</sup> 顧潮《顧頡剛年譜》1929年10月3日：「致胡適信。因何定生作《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一冊，『趁予在蘇州時印成。此次予來，見之大駭。恐小人藉此挑撥，或造謠言，即請樸社停止發行，且函告適之先生，請其勿疑及我。』」（顧潮：《顧頡剛年譜》，頁176）

<sup>34</sup> 《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20-321，1929年9月28日。

<sup>35</sup> 參《顧頡剛日記》，卷11，頁695，1979年10月9日，及頁710，1980年5月18日。然因資料之限，現無法確認何定生何時出入齊魯大學的起迄時間。



承受？……<sup>36</sup>

而滿腹牢騷的何定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於樸社出版的《詩的聽入》一書中的書尾處，也寫下了一段頗具情緒性的詞作，這首題為〈沁園春〉的詞作是何定生為《的礫小叢書》所作的序，內容如下：

自到姑蘇，並家忘却，非食有魚。過狹狹橋街，深深院宅；柔條牽惹，應榭曲紆；有意低徊，無端欲哭：所謂前生有債乎？龍蛇字，是疏狂故態，累煞瓊琚。

今予打疊長吁，則不繫朔風方物殊；正新讀元曲，橫攻蟹字，讓個頭地，供我馳驅：不寫情書，且編結集，南國詩人待笑予？竊自恕，若聰明儔匹，自審弗如。<sup>37</sup>

在《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出版之後，出現在二人文字中的，即是如同引文中的恚怒、責罵與怨懟。原先相互論學，彼此教學相長的師徒情誼，在一次次日常的衝突中幾乎消磨殆盡。學業既無成，那麼，只能出外謀職。顧頡剛轉介許多師友，希望何定生能在這些師長的身邊，繼續學習，無奈何定生性格孤傲，不願「求」人，加上情感的波瀾<sup>38</sup>，使他一直意志消沉。顧頡剛又致書給他：

你口口聲聲說我不替你找事情，你不想想，我為什麼要養你在家裏，使得自己多一筆開銷？我不是優裕的人，如何可以養食客呢。

當我和你到上海的時候，適之先生對你說：「玄同和劭西都注意你這篇東西了。」（案：〈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一文）我聽了這話，眼前頓覺一亮，我以為你的職業有路尋了。所以到平後，竭力在玄同先生前說你好話，他也答應了。哪知你去了幾封信，說的話不倫不類，使得他怕你，不敢親近你，使得我再不能替你揄揚。於是這條路斷了。

當徐旭生先生到蘇州的時候，我知道他任女師的院長，所以勸你同遊虎邱，好使他認識你。可是你只有哭喪著臉對他，一句話也不說，於是我又沒法進言了。

<sup>36</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24，1929年12月26日。

<sup>37</sup> 何定生：《詩的聽入》（北平：樸社，1929年），未標頁碼。

<sup>38</sup> 顧頡剛在1930年4月21日日記中記道：「前年在粵，光明、定生、毅卿，都是最好的學生，於學術上甚有希望者。過了一年多，定生墜入愛河了，毅卿要革命了，光明又以孟真之壓逼而失去學問之樂了。」（《顧頡剛日記》，卷2，頁394）

我又引你到援庵、上沅諸先生處，你也沒有話，並且我不和你去時你一個人也不肯去。

吳三立請你吃飯，你覺得他討厭，說：「我是不願意別人向我獻殷勤的！」

唉，天下豈有如此待人而可謀得職業者乎？<sup>39</sup>

何定生不願接受顧頡剛的安排，遲遲無法自立，二人關係更加緊張。此時何定生已搬離大石作寓所，另住省黨部，向時任河北省市黨部主席的中大老同學鄭楚生謀職<sup>40</sup>。但鄭楚生卻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猝死，何定生生計再現波瀾。於是顧頡剛又不禁為何定生的職業大感煩惱<sup>41</sup>。

不過顧頡剛似乎是多慮了，何定生當時可能早已在鄭楚生的引介下，參與了國民黨的黨務工作。如顧頡剛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的日記中寫道：

到何定生處，談時事。……今日去訪定生，見其腰配手槍。<sup>42</sup>

又其於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亦記道：

何定生來訪問予生活思想甚久，備報告中央。<sup>43</sup>

但何定生也因為參與了政治的工作而正式脫離了顧頡剛的學術圈子。

<sup>39</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27，1930年1月18日。案：關於顧頡剛這批寫給何定生的書信，吾人曾徵詢顧頡剛的女公子顧潮教授是否允許將其放入本專輯中，但顧潮教授以為不妥，此議便罷。顧潮教授的理由是：「從這批書信中，可以看出先父對何定生的期望甚高，有些批評對於年方二十歲的年輕人來說是過於嚴厲了，收入何氏專輯中似不妥當。」（顧潮致車行健電子郵件函，2009年7月25日）顧潮教授對於這批顧頡剛致何定生函的態度應是較為持平中肯的。

<sup>40</sup> 顧頡剛曾多次提及鄭楚生事，最早的是他在1929年1月6日的日記中記道：「定生、鄭楚生（國材）、蒲良柱、履安、自珍、予同到永漢院看《萬王之王》電影，楚生所請。」（《顧頡剛日記》，卷2，頁241）而在顧頡剛致何定生的信中敘及何定生搬離大石作寓所，住到省黨部時，亦連帶提及鄭氏，云：「我難得進城，楚生兄尚未看見過。閱報悉上月曾為改組派所包圍，受了些驚，聞之為念。新年中能與你同來成府嗎？」（《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324，1929年12月26日）又據《胡適日記全集》抄錄1931年3月3日《北平晨報》的報導，記載河北省市黨部鄭國材主席事（見《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頁509），可知鄭楚生時任河北省市黨部主席。

<sup>41</sup> 顧頡剛在1931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記：「覽報，悉鄭楚生（國材）病急性肺炎死，此後定生職業大是問題，恐又須漂泊矣。」（《顧頡剛日記》，卷2，頁593）

<sup>42</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頁353。

<sup>43</sup> 同前註，頁645。

### 三、諒解與失聯：1931-1980 年

雖然何定生疏離於顧頡剛的學術圈子而未能再繼續參與顧頡剛在一九三〇年代開創的學術事業，但他在抗戰之前仍然和顧頡剛保持著一定程度的關係，在顧頡剛的日記中，從一九三一年後，便曾有多次何定生往探顧頡剛的紀錄，分別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十月十一日（赴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六月十四日、九月二十一日、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七月二十七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五月二十四日、六月五日、六月十二日共十五次<sup>44</sup>。顧頡剛亦曾多次往視何定生，分別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未遇）、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未遇）、六月八日<sup>45</sup>。可以看到，即使經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衝突，二人仍相互關心，互有來往，情誼依舊。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後，為躲避日寇，顧頡剛於七月二十一日晚間匆忙離開北平<sup>46</sup>。自此之後，因戰亂的阻隔，二人聯繫遂疏。

一九三八年，何定生重試燕京大學，入歷史系，一九四一年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同年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歷史部。當時日軍已入北平，何定生於此修業僅一年，未能取得碩士學位<sup>47</sup>。一九四五年，何定生任山東濟南齊魯中學教務主任<sup>48</sup>，一九四六年二月任齊魯大學史地系講師，七月離職赴北平。同年九月任河北監察使

<sup>44</sup> 同前註，卷 2，頁 493、571、585、591、599、649、689；卷 3，頁 48、159、216、576、582、645、650、653。

<sup>45</sup> 同前註，卷 2，頁 547；卷 3，頁 342。

<sup>46</sup> 顧頡剛在《西北考察日記·序》云：「蘆溝橋戰事突起，敵人以通俗讀物之宿憾，欲致予于死地，遂別老父孀妻而長行。」（該書與王樹民 [1911-2004]《隴遊日記》合輯為《甘青聞見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 年〕，引文見頁 4）又據顧潮所述，顧頡剛是在 7 月 21 日晚與家人匆匆道別後上路。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84。

<sup>47</sup> 案：1941 年 12 月 7 日，燕京大學被日軍強行關閉，直到 1945 年 8 月 16 日後才逐漸復校。（見羅義賢：《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83、186）何定生 1941 年自燕大歷史系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同年入燕大歷史系研究院，未書畢業時間，亦無學位說明，當受時局之限，未能完成學業。自撰〈簡歷〉上寫明於燕京大學歷史所修業期限為一年，起訖時間一欄僅書民國三十年。

<sup>48</sup> 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參本專輯頁 11。

署常務祕書，隔年九月離職，回到故鄉廣東。一九四八年七月任臺灣省林產管理局祕書，隔年去職。一九四九年八月始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sup>49</sup>。一九七〇年八月三日因胰臟癌逝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sup>50</sup>。

在何定生去世九年後的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高齡八十七歲的顧頡剛，突然收到何定生學生曾志雄教授從香港九龍寄去的《定生論學集》，與此同時，曾教授也捎去何定生逝世的消息。顧頡剛為此心情激動不已，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就寫下了充滿感傷的一段話：

我在燕大時，定生曾偕其夫人來訪，知其肄業齊魯大學。自此五十年，杳不知其所在。今日得九龍寄來臺灣出版之《論學集》，乃知大陸解放後渠在臺北大學任教，且已逝世十餘年。其所論《詩經》與孔學，實為我論學諸文之發展。惜哉此人，如此早逝，真可悲也。<sup>51</sup>

隔了十六天後，他又在日記中寫下他對何定生的懷念：

何定生君多年不見，不知其何往，今得其弟子曾志雄寄其遺著《定生論學集》來，乃知其大革命設教於臺北大學，且病癌症死已十年矣。傷哉，此係余中山大學中最能集中精神以治學之一人也！書中有〈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長文，將《詩經》與《儀禮》詳細關係鉤索而出，以駁正余倉卒所為之〈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之說，使我心服。<sup>52</sup>

又隔了半年多，顧頡剛對何定生仍思念不已，他再一次的在日記中記下他對這位曾經傾盡全力栽培的學生的回憶，云：

何定生，廣州潮州人。學於中山大學，天分絕高，為一班首。曾以半年之力作〈尚書各篇之時代分析〉。予為之請於校當局，給以獎金二百元。一時忌者蜂起，謠誣紛來（可指名者為伍倬、羅庸、羅常培等）。渠不安於位，遂請退學，隨予至蘇、至京，又以作文批評胡適，激起北大方面之口舌，遂捨予而試入齊魯大學。曾到燕京大學視予，匆匆而去。此後僅一見面耳。病前接其弟子曾志雄寄來《定生論學集》一冊，研究《詩經》與孔學，知其在臺

<sup>49</sup> 以上據何定生〈簡歷〉。

<sup>50</sup> 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參本專輯頁24。

<sup>51</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11，頁695，1979年10月9日。

<sup>52</sup> 同前註，頁698，1979年10月25日。

灣大學任課。然已死十年矣，傷哉未盡其壽也！<sup>53</sup>

從幾番的「惜哉」、「傷哉」的文詞表露，可見他對何定生的痛惜之情綿延、橫互了半年多，仍然未曾消歇，在這些真情流露的追憶中，確實令人感受到了顧頡剛內心的不捨與哀痛。

對於何定生的二部著作，顧頡剛在收到書後的連續數日皆手不釋卷，期間除了因病未記錄閱讀進度外，直到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都仍有其閱讀的紀錄。最後一次的紀錄是在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他讚賞何定生說：「看《定生論學集》，仍未畢，足見其工作之細。」<sup>54</sup> 總的來說，顧頡剛對他這位早年的弟子之學術表現還是頗為肯定的，固然一方面仍然認為其所論《詩經》與孔學為他論學諸文之發展，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認何定生對《詩經》的研究在某些地方已超出了他的成就。曾志雄在〈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一文中就對何定生《詩經》學與古史辨派的既繼承又超越的關係做了如下的評論：

何老師研究《詩經》從古字義和古代禮樂制度出發，注重探求《詩經》的原始面貌和時代意義，以此填補古史辨派對《詩經》研究的不足，這是一般人不易為之的事。由於他親身經歷古史辨派的洗禮，對當時《詩經》研究的情況瞭如指掌，所以晚年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在世的最後幾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詩經今論》，該書一方面挖掘過去「疑古派」在討論《詩經》上的不足，特別著力於〈雅〉、〈頌〉禮儀意義的探討；一方面也深入而有系統地闡述了漢人對待《詩經》的態度，以及這種態度對後人的影響。書中對《詩經》問題前後照應，可以說繼往開來；在評述學者觀點時深入淺出，尤見識力，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文章中看問題之準，找證據之精，更往往叫人歎為觀止。<sup>55</sup>

至於何定生本人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曾志雄在文中很忠實地記錄下了何定生自己的評語：

<sup>53</sup> 同前註，頁 710，1980 年 5 月 18 日。

<sup>54</sup> 《顧頡剛日記》記載顧頡剛看何定生著作事共八次，分別是 1979 年 10 月 9 日、10 日、11 日、24 日、25 日、26 日、1980 年 5 月 18 日、20 日。參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11，頁 695、696、698、699、709、710。

<sup>55</sup> 曾志雄：〈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參本專輯頁 72。

他對自己的《詩經》專題研究表現深具信心。他曾經自豪地對我說了不只一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詩經》的 Koo's Age（顧頡剛時代），現在是《詩經》的 Ho's Age（何定生時代）！<sup>56</sup>

當年為了中山大學獎學金之事，何定生回了一封信給顧頡剛，在信末他曾豪氣干雲的向一路相挺他的恩師顧頡剛發下豪語：「請看定生一顯其好身手！」<sup>57</sup> 事隔數十年後，何定生終以傑出的《詩經》研究展現出了他的「好身手」，讓顧頡剛刮目相看，或許這就是回報一路挺身愛護他的顧老師的最佳方式。

何定生有幸成為顧頡剛入室弟子，並能近身學習。展觀現存的書信、日記及相關回憶紀錄，仍能讓人感受師弟二人相互間真摯的情誼，以及對學術的熱情與執著，讓人在學術理性的知識建構與傳播之外，更可以感知到學術作為一種安身立命的情感依傍與志業追求。

---

<sup>56</sup> 同前註。

<sup>57</sup> 顧頡剛：〈致何定生〉，《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二》，頁 321，1929 年 10 月 10 日。